

烈焰与红莲

鄢烈山◎著

烈焰与红莲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目录

导 言

作者与作品	1
-------	---

访 谈

郝烈山答记者问	3
---------	---

第一辑

毁誉何人判真伪	14
每个民族都有过辉煌史	17
曾国藩“无慢室”赞	24
刘文彩庄园的“典型化”	30
历史的公道何在	34
石碑见证古民约	40
感恩造福者八田与一	45
台湾民间社会的“点、线、块”	49
日本人这般看待被“开港”	53

第二辑

复我故园待何日	60
我的两个老妈妈	65
我的珍本莎剧	75
失而复得的大学	77

目录

涌泉之感	80
五一六：那年我看见	88
“桥园”里的下午茶	95

第三辑

“潜规则”，不如叫“现规则”或“奸规则”	104
为谁治水？	107
“汉奸”辨	110
“贪生怕死”的权利	114
“人”的挺立	121
杀人的理由	124
早春的感动	128

第四辑

“孝”文化的当代困境	132
论董狐笔法	136
对孔子要行中庸之道	138
唱不尽古今旷男怨	141
养成一单单说事的习惯	148
为祖先道歉的文明史意义	151
从《灰阑记》到《霸王别姬》	154

目 录

第五辑

无声的雨	158
由《小芳》想到美国大兵	160
“大红灯笼”何所似	162
“曾志伟”的得意和沮麇的缺席	164
论段小楼的被驯服	167
从电影《春苗》看民粹主义	170

第六辑

侠客梦的缘起	176
鲜花与玫瑰	180
“诱以官禄德”	183
叶公超的气度与才识	185
“但愿留下的阴影散去”	190
孔夫子论“卡扎菲”	202
鲜为人知的废奴英雄：威伯福斯	205
“只属于一个人的城邦不算城邦”	211

作者与作品

刘克定

鄢烈山，资深报纸编辑、当代著名杂文家、专栏作家。1952年1月出生，生于湖北省江汉平原；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此前做过农民、民办小学教师与中等师范学校函授教师，大学毕业后在政府机关工作三年；1986年春入新闻界，退休前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南方周末报社总编辑助理。现为个人纪事丛书《白纸黑字》系列主编。

自1984年以来坚持杂文、随笔和散文写作，迄今在海内外出版《冷门话题》《钢丝上的中国》等杂文、时评和随笔集20多种。其中《一个人的经典》获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第三届（2001—2013）“鲁迅文学奖”。并著有长篇史传《威风悲歌：狂人李贽传》。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在南方周末写的“纵横谈”专栏，开新时期时评新风，在全国新闻界、知识界产生广泛影响。

近30年间，作者在新闻时评之外，写了大量杂文与随笔，涉及旅游、情感、思想、文化、影视和读书等众多题材。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也是作者的创作特色，即关注中国现实，由此及彼，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有较强的启迪性。

鄢烈山的杂文和随笔久负盛名，敢于针砭时弊，具有强烈的思辨性，深受读者欢迎。本书所收篇章，每一篇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了不同的人生经历，谈到了治学、写作、交游，用形象、生动、质朴的语言，和读者探讨人生、社会、情感、思想、学问，表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学识和文字功底，使读者尝鼎一脔，获益良多。

思想类随笔如《贪生怕死的权利》，为人的本能辩护，承续先秦儒家“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本真思想，反高调，提倡人道主义，在今天读来犹能振聋发聩。

旅游类如《台湾民间社会的点线面》，简洁明快地勾画了台湾的社会建设实践，既宏观又生动。

个人情感类如《我的两个老妈妈》，写的虽是两位农村妇女的人生故事，篇幅也不长，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性特征。

历史与读书类如《侠客梦的缘起》，在金庸武侠小说与影视大行其道之时，以历史的纵深视角，揭示其虚妄，有棒喝之功。

影视歌娱乐类如《小芳与美国大兵》《无声的雨》，可见作者文思缜密，设身处地，体察入微。

作者文史知识广博，在运用中信手拈来，形诸笔端，宛如巧合而无一点书呆气，先秦诸子、汉魏风骨、明清政制……征引如探囊取物，好似古人寻他，而非他觅古人，此等造诣，非一日之功。

有人说，饭百政治家，不如饭一文学家。优秀文学家和他们的优秀作品，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引导、启发人们的思想觉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似朴实的编年史，赋予我们一部矗立于1816年至1848年这一转型期的法兰西社会最值得瞩目的文学丰碑。现今的文学艺术，包括小说、散文、随笔、杂文、戏剧等，正是这个时代前进的推手，其力量远非口号、金钱以及变幻无穷的伪文化所能及。我从鄢烈山的作品里，读懂了这个道理。

关于书名《烈焰与红莲》，作者解释说：有位法师给我的题词里有句“烈焰化红莲”，此乃佛家修炼之义，即希望我“烈焰”（怒火，佛家所谓“贪嗔痴”三毒之一的“嗔”）化为宁静的“莲花”；“我这里将‘烈焰’与‘红莲’并列，不过是说，世俗之人，既对邪恶怀有正义的愤怒，更有对平和净静境界的赞赏与向往”。

就让红莲开得更灿烂吧。

2016年1月24日

鄢烈山答记者问

发表杂文是有风险的

李东：您好鄢老师！您是以杂文写作走进公众视野的，单从报刊来看，杂文比小说、散文、诗歌刊发的平台要少，同样是文学作品，杂文似乎面临“不公”待遇，您如何看待？

鄢烈山：我没有这种“不公”的感觉。我觉得很正常，不论是为读者服务，还是为政治服务，杂文版面占多少都是某种需求的产物。

“杂文”正如其名显示的，从来就不是文学的正宗。现代杂文最繁荣的“鲁迅时代”，它又叫“小品文”。

网络时代，报刊发表杂文的园地更少了，有话直说的时评时兴了，这是社会的进步，我们应该为之高兴。不便直说，或者侧重表达情感而不重讲理的“杂文”，在网上多得很，长短不拘，从短信段子到“恶搞”文章，都可以算是新型杂文。

只要写得有观点有味道，“杂文”不愁没有发表平台，不愁没有人“疯传”了。

李东：新作《中国杂文百部·鄢烈山集》自序中，您写到“我们的杂文，正是以百折不回的精神，为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多元文化做出了贡献。”您觉得杂文的发展在这“百折不回”中面临哪些困境？

鄢烈山：所谓“我们的杂文”，是一种总体评价，而且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就杂文界讲，1949年以来，大多数作家是尽可能在争取讲点真心话，讲点针砭时弊的话，但也有把杂文写成跟风“大批判”文章的，也有所谓用“新基调杂文”取代“鲁迅风”的杂文写作理论。就单个杂文家来讲，可能大多数作品是批判性的，所谓“投枪、匕首”或“解剖刀、银针”，价值观念是可取的；但也有些篇章可能是宣扬了某种陈腐的思想观念。比如，老杂文家林放（即老报人赵超构），“文革”后在《新民晚报》的“未晚谈”专栏，有许多好文章，也有一些很不怎么样的杂文。

当代的杂文的困境，一直是不能比较自由地表达思想，最好的选择是“莫言”（沉默不语或歌功颂德，以及跟风批“帝修反”“打死老虎”）。不要说“反右”时期和“文革”中，拿写杂文的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祭旗，就是在因特网时代，网上发表杂文也是有风险的。

另外一个困境，就是杂文作者说来说去，都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常识，所谓“启蒙”，连自己都觉得无趣。（邵燕祥先生前两年曾说，再也不写反腐败题材的杂文！）而一事一议的时评，因针对性较强，题材有点新鲜感，读者更多一点。

再有，就是一些杂文作者的观念跟不上时代进步，上面说的林放先生即一例；我这种人没有经济和法律等专业背景，观念都是常识，文章没有深度。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要从头开始专一门很难。

不过，学习是没有止境的，社会在变，传播手段越来越先进，比如微信公众账号其实就是电子杂志，雨后春笋般兴起，从前难以看到的文章现在很容易分享，只要肯学还是会有很多收获的。

李东：在当前全民娱乐化、文化快餐化时代，您觉得杂文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鄢烈山：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杂文的存在就更有意义了：它是激活人们思想的，是以社会批判为志职的，可以对这个时代起到补弊救偏的作用，至少可以满足那些关心社会进步者的阅读需要——中国这么大，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永远不可能只有一种爱好和偏好。

杂文最重是风骨

李东：网络上有人亲切称您为“当代鲁迅”，您也凭杂文荣获过鲁迅文学奖，你觉得的当下杂文和鲁迅时期的杂文相比，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鄢烈山：称我是“当代鲁迅”，是部分人的偏爱，实在愧不敢当。鲁迅100年只有一个，“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仅杂文项就三年一个，显然不可相提并论。

当下杂文写得好的，与鲁迅时期的杂文（当然也是指好的，不包括创造社郭沫若那伙人和“四条汉子”那种年轻人，攻击鲁迅的“唯我独革”的文章），有共同点，那就是独立人格、批判精神。这一点，鲁迅先生1927年底在暨南大学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表达得很清楚：文艺就是批评社会现状，批评掌权者的，因此掌权者在夺取政权阶段视为同盟军，掌权之后就要箝制批评他们的文艺。

鲁迅杂文的长处是对旧制度旧文化旧传统，乃至对人性的幽暗有透彻的认识，而受限于他所处的时代。当下的杂文家，是后来者，是“事后诸葛亮”，因特网提供的海量信息也远非鲁迅的知识范围可以相比，很多观念自然应当比鲁迅更符合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

李东：“公民写作”是您所推崇的，被视为杂文写作新概念，那么它有哪些显著特征？

鄢烈山：将“公民写作”概念引进杂文写作领域，并不是说只有杂文作者要有公民意识。每一个写作者，除了给领导和老板代笔的秘书，包括写议案的人大代表和写提案的政协委员，都要有公民意识。公民意识，第一是平等意识，不是谁的奴隶和奴才；第二是权利意识，首要的是宪法确认的包括言论自由和参与公共事务、监督各级权力机关等公民权利、社会经济权利；第三是要有社会责任感，权利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等等。

我曾在阐述公民写作概念时写道：宪法赋予“我”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表达个人见解、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发言，“我手写我心”，本是“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我不比谁高尚，没有宣道传教者的优越感，并不想居高临下地教诲任何人；也不比谁高明，既不想做“王者师”，也不想当启蒙塾师。我只是一个公民，是我所是，非我所非。

我不比谁卑贱，一不稀罕待诏金马门代“圣上”拟旨的恩宠，二不想要“文死谏”留名青史的虚荣，更不是出入廊庙供主子解闷的优伶或奉旨骂人的阉奴。我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思我所见，言我所想。

我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反对派，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志趣；不愿跟着别人的指挥棒做“合唱”队员，也不想存心搅局与谁过不去。我只是一个公民，自认为依法享有个人权利的自由人，眼里容不得砂子，心里憋不住疑问……

以上表述中“宪法赋予”的“赋予”一词应该改正为“确认”。我们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所谓“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宪法只是以最高法律载明而已，我们的基本人权并不因谁改写了宪法就可以合法丧失。

李东：你眼中优秀的杂文是什么样子的？

鄢烈山：杂文最重是风骨，不媚权不媚俗，是我所是、非我所非，心忧天下，为民请命，匡扶正义，寻求公道。所以，好的杂文作者一定是敢爱敢恨不信邪的性情中人，好杂文一定彰显出一种苏世独立的人格、自由奔放的精神和强烈自觉的公民意识。在好杂文里，情感的力量、道义的力量与人格的力量是水乳交融的。

好杂文，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能带给读者“思维的乐趣”，有一种智慧之美。杂文是批判的艺术，更是思辨的艺术。它让人们对习焉不察的现象或安之若素的观念重新审视，产生“原来如此”之悟，这就是一种发现的快乐。知人论世洞幽烛微，辨奸揭伪直捣黄龙，要有胆更要有识。

好杂文追求独到的见解，不避“片面”之讥，因为它不想独占话语权而终结真理，只想激活人类的思维，其“独见之处，即其精光不可磨灭者”。

这与杂文靠严谨的逻辑征服人并不冲突。比如，1980年吴有恒发表的《〈东方红〉这首歌》，将其歌颂“大救星”的有神论与《国际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无神论“相提并论”，呈现矛盾之所在，批评搞“个人崇拜”的“凡是派”的荒谬不经，就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好杂文有情有“义”，还有“文”。“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这是当下大多数新闻时评之所以只可“一次性消费”而不能当杂文一读再读的重要原因之一。“杂而有文”并非说杂文不能直抒胸臆、一吐为快。须知“隐晦、曲折”并不是所谓“鲁迅风”的精髓，那是一种专制社会的生存技巧和叙述策略，是不自由国度里奴隶的语言，而不是主权在民社会里应有的公民风范。

杂文的“文”，可以是选题炼意上的典型化、形象化和超越具体人事的“非指称化”，比如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可以是谋篇布局上的讽喻性、暗示性，比如丰子恺的《口中剿匪记》；可以借用寓言、故事新编、小小说等各种文体形式，但说到底，“杂文味”在文采方面是靠“语感”表现出来的。不论是辛辣还是幽默，是冷峻还是热烈，是平实还是尖刻，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书吴道子画后》），都要靠语言来承载来营造。

杂文的语言也有“弹性”大小、“密度”高低和“质料”优劣，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语言的艺术是天赋，更是追求的结果，先天后天融为一体，使杂文呈现出个性。修辞立其诚，兼有思想个性与语言个性，才是最上乘的杂文。

李东：杂文的写作，应该说是很有难度的，因为“杂”，所以要求写作者有海量的知识储备，内心不但要存储一座图书馆，还应有个人的思想理论体系。对此，您做过哪些努力？

鄢烈山：很遗憾，我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出生在穷乡僻壤和贫寒农家，小时候除了课本几乎无书可读，课外也就是看讲古的花鼓戏、皮影戏，背了一下《百家姓》；15岁到25岁学习能力最好的岁月献给了文革。27岁才上大学，此前满脑子装的是“毛选”四卷、样板戏和“共军”抗日、“国共”内战题

材的小说。

很惭愧，虽然后来补读了不少书，连下棋、打扑克的消遣也戒了，但没有专门研究领域，二没有理论体系。如果说有体系，那也是出于人的本性和现代社会的常识，建立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现代价值体系，不管是叫“普世价值”还是叫“核心价值”，对我都无所谓。

尽管如此，我从来没有放弃阅读和思考，总是在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思维。这是一种精神需要，也是一种文化享受。

自由写作者，都应该有独立人格

李东：您曾主持的《南方周末》“时事纵横”和之后《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被誉为“时评双璧”。请您讲讲在您主持该栏目期间的一些重要文章或事件。

鄢烈山：这个问题说来话长。这里只讲与我个人经历有关的。1996年1月起《南方周末》扩为16个版，从文化娱乐报转型为新闻时事为主打的综合性周报。《时事纵横》放在第二版，就是学《纽约时报》，把“卖观点”的评论（社论和来论）作为拳头产品，但考虑到时机还不够成熟，就先办成了文摘加评点的样式，其中有“专家视角”（又曾名“学者论坛”）和我个人的专栏“阅报札记”（后改名“纵横谈”）是完全意义的上评论。我的专栏先后写了5年多，1996年1月到1998年10月用的是本名“鄢烈山”，之后用的是“刘友德”“余卫国”“张明来”等化名。

吊诡的是，在《南方周末》用本名写个人专栏的三年，是我职业和写作生涯的顶峰；以当时南方周末报的影响力，许多知名作家知道了我，对我的文章和观念表示相当程度的认同。因此，我的杂文选集《一个人经典》（200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主持评奖的“全国第三届（2001—2003）鲁迅文学奖（杂文项）”，虽然我并不是中国作协会员，也根本不会为

获奖去“公关”。可见作家评委们是认可我的。

在主持该版期间，我写了一些文章，在当时的中国可能算是言人所不能言的，比如批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的《粗制滥造的标本》，讲红色高棉的《别了，波尔布特大哥？》，批警匪勾结的《红与黑》，还有《“权力资本”》《“市长经济”》《道德“悬棺”》等，在当时都算比较尖锐的。

另外，我在《时事纵横》版“学者论坛”专栏请王小波写文化评论，当时他远没有后来的名声；可惜我刚给他开了个人专栏《世说心语》，他却英年早逝了。

这是《南方周末》的好传统，领导只管编辑方针和总体设计，只对单篇进行政治把关，责任编辑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最终考评权在年度的读者投票。

李东：在您主编的《白纸黑字》创刊号前言中，曾写到该书的奋斗目标是出版“留得下来的文字”，当时创办这样一本刊物的初衷是什么？从出版的几期反馈来看，您觉得达到预期效果了吗？

鄢烈山：我们创办《白纸黑字》丛书，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就是想为历史做见证。与《读库》的综合性不同，我们开的是“专卖店”，只编个人纪实文字，不仅强调“非虚构”，而且要是亲历亲闻（包括为别人做口述实录，包括访谈）。这有点像《老照片》，不过它们是以照片为线索和依托展开记叙，《白纸黑字》不一定有图为证。

所谓“留得下来的文字”，一是要真实，经得起历史考证，二是文字有一定的可读性，有收藏价值，不是让人看了就想扔的文字垃圾。这当然只是一个理想目标。

到现在为止，这套丛书只出了3期，2011年创办出了一期；2012年出了两期。说不上畅销，因为则开张，营销没跟上，但反响还是不错的，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

第4期是十八大召开前夕编好的，比前三期都更谨慎，但先后经过了敦煌文艺、花城、新星、法律和九州五家出版社，审稿都没有通过。那也没办法，耐心等待时机吧。我们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碰。事实上，在因特网时代，无法完全限制人们的表达。电子杂志会越来越多，

不需要谁审稿。凯迪网搞了个《百姓家史》频道，投稿的人很踊跃，那就是“白纸黑字”嘛！

李东：您早年主要写杂文，而后转向时评，您觉得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鄢烈山：我想，杂文与时评的共同点：都有思辨性、批判性，都是识见第一。不同的是，时评的题材限于时事，杂文则广泛得多，天文地理历史现实无不拿来做文章；更重要的是，时评侧重逻辑思维与论证，更重理性；而杂文可以是形象思维，文学性可以很强，可以是情感宣泄，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李东：时评和杂文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针砭时弊，从某种程度上讲，文章肯定会触及某些机构或个人的利益。对此，您是否有过退缩的念头？您觉得时评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鄢烈山：我写文章对事不对人，主要是表达观点；即便涉及到有名有姓的事例，也是正规报道的材料，没有遇到谁要告我的。至于有谁讨厌我，那就随便。反正我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也没有什么把柄可以把我开除或抓起来。惭愧，我不是“行动派”；写文章传播某种价值观，争取影响更多人的思维，就是我的“行动”。

时评家也好，杂文家也罢，凡是自由写作者，都应该有独立人格，坚守良知而不出卖灵魂，勤于观察和思考，勇于讲真话。

思想文化不可扼杀

李东：您曾在天涯论坛发表了一篇《赤子韩寒》，对韩寒盛赞有加，而另一篇博文《郭敬明入中国作协：一场多边的不道德交易》，两篇文章可以看出您对80后两位代表人物截然不同的态度。请您以此为例，谈谈对当下青年人（特别是青年作家）的看法。

鄢烈山：这两篇文章都是在一定语境下写的，并不代表我对两人的全部评价，有侧重一点，就事论事的意思。事实上我对两人并无全面的了解，也

不想把自己与两人荣辱捆绑在一起。前一篇强调率真；后一篇是对作协如此“拉人”的不屑。当下的青年人，我了解有限。无论如何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他们终会成为中国的中坚，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不论多么扭曲，我们“红卫兵”一代，现在的“小皇帝们”，都各有不同的社会性弱点，但我相信人的本性不可改变，那就是要平等要自由，“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博弈中会产生规则，社会总是进步的。“世界潮流不可阻挡”，在信息化时代绝不是一句安慰人的空话。

李东：随着传媒方式的多元化，娱乐类、选秀类节目在各大卫视以层出不穷的花样争夺收视率，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鄢烈山：在当前的舆论管制条件下，出现这种状况很正常，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大家都要生存嘛。但是时代不同了，人们在网上看美剧、韩剧和日剧，思想文化的竞争是不可扼杀的。中国应该真有“自信”，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敢于对外开放，这是道义的信心或文化的自信。

李东：有人断言“电子传媒终将替代传统纸质媒体”，作为多年资深报人，您认同这个观点吗？您觉得电子化时代，传统纸质媒体的出路在哪里？

鄢烈山：电子传媒必将替代传统纸质媒体，就像钢笔取代毛笔，电灯取代蜡烛，但是现在也有人写毛笔字，有人点蜡烛，搞点情调嘛。

现在虽说已进入电子化时代，但还是过渡时期，传统纸质媒体还有读者，一些中老年人不上网还要看纸质的东西。老毛老蒋那时已有钢笔，但他们习惯了用毛笔呀。纸质媒体，当然要考虑转型。其实很多企业行业都面临技术进步的挑战。要被社会淘汰就让它淘汰好了，虽然说起来冷酷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像办“白喜事”。公共汽车不用人售票了，胶卷制造和冲洗行业完蛋了，又有什么可惜的？

李东：微博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便捷、自由的特性使其迅速成为网民的好伙伴。我注意到您也是“微博达人”，那么您如何看待微博？

鄢烈山：我算不上“微博达人”，我开始得晚，2011年3月21日才注册两家，2013年初才在新浪微博玩。微博已经被微信取代了。央视的新闻联播，现在播完后，主播会说请大家关注央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新闻客户端。

新技术层出不穷，这是大好事，人们有了更多的表达空间。贪官污吏最怕这个了：上传照片、音频和视频，“有图有真相”，想抵赖难，想一掌遮天更难。

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

李东：多年前，您大学毕业后被分到政府部门工作，这在常人看来是多么好的工作机会，您却不以为然，四年后一头扎进媒体行业。事实证明您当年的选择是对的，但是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大胆的决定？有想过失败吗？

鄢烈山：在我的乡亲们看来，我一点不成功。到退休也没当上官，也没有亲戚沾上我的光安排工作。我若留在政府机关工作，80年代就肯定是处级官员了……人各有志，我自己觉得这辈子相对而言活得比较有尊严，不用“摧眉折腰事权贵，教我不得开心颜”。

我那个辞官决定算不上大胆，我早想好了退路：大不了到中学当老师，我是师范大学毕业的。

李东：作为一种表明自己观点和立场的新闻文体，时评肯定常会遇到不同的声音甚至遭到质疑，当别人不认可您的观点时，您如何应对？

鄢烈山：有人不认可我的观点，我觉得很正常。或者汲取别人的思想，或者不理睬，或者反驳——感谢他为我提供了再写一篇的题材。除了某些辱及父母的人身攻击，骂我“汉奸”我也不会生气。对某些攻讦，就当他“神经病”好了，甘当阿Q。给人家做出气对象，也是积德。

李东：写作对您意味着什么？您对青年写作者有什么建议或者忠告？

鄢烈山：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参与社会事务的方式，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没有“扬名立万”的追求。

转赠胡适的一段话，作为我给青年写作者的建议和忠告：“堕落的方式很多，总结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第二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追求。”



（原载2014年第2期《延河》，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第一辑

毁誉何人判真伪

每个民族都有过辉煌史

曾国藩“无慢室”赞

刘文彩庄园的“典型化”

历史的公道何在

石碑见证古民约

感恩造福者八田与一

台湾民间社会的“点、线、块”

日本人这般看待被“开港”

